



近代“女性自立”视域下的刺绣教育研究

李建亮

(浙江理工大学, a. 服装学院; b.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培养研究基地数智风格与创意设计研究中心, 杭州 310018)

摘要: 围绕近代女性社会身份及地位的转换, 通过文献资料搜集、个案分析等方法, 探讨了近代刺绣教育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课程特色、培养模式方面的做法, 以及为促进“女性自立”所做出的探索和革新。研究发现, 刺绣教育是近代新的社会生产关系重构中为了迎合女性社会身份及地位转变中的适应性发展, 其不仅为广大女性提供了实现经济自立的职业手段, 塑造了贤妻良母的近代女性形象, 展现出女性通过刺绣出口创汇救国于危难中的公民担当, 而且无形中促进了传统刺绣技艺的创新发展, 发挥了工艺美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及价值。该研究为认识中国近代工艺美术教育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有助于进一步推进近代中国工艺美术传承发展研究。

关键词: 刺绣教育; 女性自立; 近代; 女工传习所

中图分类号: G5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24) 04-0173-07

Study on embroidery education under the vision of modern "female self-reliance"

LI Jianliang

(a. School of Fashion Design & Engineering; b. Digital Intelligence Style and Creative Design Research Center, key Research Cente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of Zhejiang Province,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women's social identity and statu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modern embroidery education in terms of curriculum design, teaching content, curriculum characteristics, and training models to promote "female self-reliance" through the literature collection and case analysis methods. It is found that embroidery education is an adaptive development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new social production relations in modern times to cater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men's social identity and status. It not only provides professional means for women to achieve economic self-reliance, shapes the image of modern women as virtuous wives and mothers, demonstrates the civic responsibility of women to save the country from danger through embroidery exports, but also invisibly promotes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embroidery techniques, and has played the role and value of arts and crafts in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stud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modern Chinese arts and crafts education, and helps to clarify the research on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arts and crafts.

Key words: embroidery education; female self-reliance; modern; women workers' schools

收稿日期: 2023-08-03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1-05

基金项目: 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Z22JC075); 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2022SCG340)

作者简介: 李建亮(1982—), 男, 山东潍坊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传统图案文化与纺织品艺术设计等方面的研究。

自19世纪末以来,随着西风东渐和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争自由、谋独立”成为女性觉醒的重要标志,先进女性开始积极呼吁女性自立。从政府到黎民,社会各个阶层也都为实现女性的自立自强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在这场探索中,脱胎于传统“妇功”的刺绣成为广大女性谋求自立的最好选择。各种女子传习所、教会女校及女子师范学校等积极开展刺绣教育,不仅帮助广大女性实现了自强自立,也推动了传统刺绣的发展。当前对近代刺绣教育的研究多侧重刺绣教育本身或刺绣教育家个案分析。如,于书娟等^[1]、张蕾^[2]从社会背景、教育特色出发,分析了近代江南地区刺绣教育的重要价值。孙佩兰^[3]、林书羽^[4]以沈寿为个案,认为刺绣教育在促进女性社会身份地位的转变以及刺绣创新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从女性自立视角研究近代刺绣教育的较少,郭淑敏^[5]、方秀洁^[6]探讨了刺绣工艺对女性知识的建构、促进女性从传统女红到女美术家的社会角色变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近代刺绣教育的目标和特征进一步梳理和分析,探讨近代刺绣教育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课程特色、培养模式方面的做法,以及为促进“女性自立”所做出的探索和革新,挖掘刺绣教育在女性社会身份及地位转换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及价值,为理清近代中国工艺美术传承发展问题提供一个新视角,而且对当代传统工艺的传承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近代女性谋求自立中的刺绣教育萌芽

“兴女学、谋生计”是近代女性自立的重要途径。在传统“三从四德”等性别伦理观念的禁锢和压制下,女子长期依赖于男性而不能自立,究其根源在于男女不平等的学习权力。在中国近代,从维新派人士到实业家等众多有识之士,都意识到“解放女性,兴办女学”不仅仅是女性自立的重要途径,更关系到国家富强兴盛、民族兴亡。1897年,梁启超在《论女学》中讲到:“今日之中国,而与人言妇学,闻者必曰,天下之事其更急于是者,不知凡几,百举未兴,而汲汲论此,非知本之言也。然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7]著名实业家张謇曾愤慨道:“学之不明,而千百年来女界乃独罹其黑暗矣!”“欲救其弊,惟有兴学。”^[8]近代女权思想的倡导者秋瑾也提出“欲自立,非求学艺不可”^[9]。在此背景下,清政府于1907年颁布了《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标志着女子自此能进入学校接受合法的教育。此后,各种手工女学校及女工传习所

陆续兴办,为刺绣教育的萌芽奠定了社会基础。

在近代女子教育体系中,教学内容更多地借鉴了日本的教学经验,主要开展裁缝、刺绣、织造等女性容易操作的课程教学,着重发展女子的职业能力,培养社会需要的实用人才。刺绣作为传统女红的必备技艺,具有广泛的女性群众基础和接受度,所以不仅成为女子师范等众多女学中的必修课程,还出现了一批专门教授刺绣的工艺传习所。如1907年,李佩黻在无锡创办的锡山绣工传习会;1912年,张华璈在上海甘肃路开创女子刺绣传习所;1914年,张謇及沈寿在南通创办南通女工传习所(图1)。刺绣传习所在全国遍地开花,开创女子职业教育之先锋,并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刺绣教育家,如李佩黻、沈寿、张华璈、杨守玉等。



图1 南通女工传习所刺绣班学生上课照片^①

刺绣教育成为近代中国女性寻求自立的主要途径,是当时社会条件下大众对女性职业认知的使然,也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必然选择。首先,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形成的对女性身份地位的固有认知,不可能在短时间彻底消除,女子出入学校、在社会上抛头露面仍受到思想顽固分子的抵制和反对。而女子学绣并未完全逾越传统女性的限制,女学或刺绣传习所也以女学生为主,并非男女混杂之地,女子学成之后可以从绣庄领回花稿在家施绣,这样刺绣之余还可以管理家政,这些都使女子寻求自立得到一定的社会认可。其次,长久的“男耕女织”农业生产关系形成了女红传统,也使刺绣被认为是一种“适宜于女子”的职业。如当时中华女子美术公司总经理唐家伟女士所讲:“中国女子的性质本就与美术、刺绣接近。”^[10]不难看出,女子刺绣符合当时国人思想意识中根深蒂固的女性形象设定,刺绣是与

^① 图片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网: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rdzt/zgjggy/tpzb/201807/t20180717_297482.html。

女性气质相联系,刺绣教育的萌蘖也是没有跳出传统观念束缚的一种表现。

可见,在近代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的转型中,旧思想根深蒂固,新思想尚未完全确立。女性谋求自立,要以新的角色积极融入社会,脱胎于传统“妇功”的刺绣自然成为刚刚走出封建禁锢的女性的自立途经之一。女性通过习绣,不仅可以免于受到封建顽固势力的嘲讽,还可以寻求经济上的自立,更展现出女性在“工艺救国”时代号召下作为新国民的责任担当。在此背景下,刺绣教育应运而生,也为刺绣工艺引入了一种全新的传承方式。

二、近代刺绣教育的目标

通过刺绣教育培养女子自立于社会的生存之技,打造能承担社会义务的贤妻良母,以及以工艺促实业,达到实业救国的目的,是近代刺绣教育的主要目标。如张謇在创办南通女工传习所时强调:“且使女子们学得一技之长,造福于社会与家庭,更为自己谋得一席之地。”吕凤子在讲到正则女子学校的办学目的时,也说:“我办女子职业学校,是为了提高女子的社会地位,把学校作为实施美育主张的实验园地。我主张万异并存、并成的原意是说,任何人都有机会受到平等的教育,而各展其才,各成其业。”^[11]

(一) 女性个体的经济自立

“谋求女子解放而自立于社会,首先必须要谋求女子的经济自立。在时人的认识中,女子学习刺绣即是实现经济独立而自立于社会的一个有效途径。”^[12]近代刺绣教育的首要目标,即在新的社会生产关系中为刚刚解放的女性培养自谋生活的技能。如恩格斯所讲:“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妇女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13]众多刺绣传习所的开办也本着同样的初衷,即是为刚从封建社会走出来的女性提供一技之长,改掉传统女性依赖男性生活的习惯。通过职业自立,女性既可以补贴家庭,造福社会,还可以提升在新的生产关系下的社会地位,实现女性的真正平等与自立。

刺绣教育作为近代女子职业教育的一种,确实为地方广大女性提供了自谋生活的职业技能,可以让她们凭借一己之力养活自己,甚至补贴家用。如张竹君1904年在上海、河南分别创办了女子工艺厂,招收妇女120多人,教授刺绣;南通女工传习所在沈寿的主持下,前后总共培养刺绣人员300余人;宁波地区的仁慈堂天主教会也培养了千余名刺绣从业者^[14]。女性的经济自立不仅让她们摆脱了依赖

男性的旧习,为家庭带来经济收入,也使女性的家庭及社会地位不断提升,为女性赢得了应有的尊重。诚如秋瑾所说:“如今女学堂也多了,女工艺也兴了,但学得科学工艺,做教习,开工厂,何尝不可自己养活自己吗?也不致坐食,累及父兄、夫子了。”^[9]

广大女性在学习刺绣的同时能接触和学习到其他方面的知识,更全面地树立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因此也逐渐建构起女性的职业理想。随着刺绣传习所等刺绣教育的广泛开展,当时各大报纸杂志上刊载了大量介绍女性以刺绣谋求自立的文章,如涿县胡大呆撰文:“刺绣是女子力所能及的工作,只要能够打破拘泥的礼节和依赖丈夫的旧习,妇女就可以借此自立于社会。”^[15]董直撰文:“我国人口以四万万计之,男女各居其半,男子既赖职业以自立,女子亦当谋职业以图自立,女子职业之最切近者,缝纫与刺绣,其他若教务,若保姆,若医学,亦足以赖其所入,自贍其身,不当依赖男子也。”^[16]这些报刊文章及刺绣广告为广大女性树立了“职业女性”的人生理想,吸引广大女性积极投入刺绣行业,一些突出的刺绣者更是被赋予刺绣“美术家”的尊称,反映出当时女性地位的提升及受社会尊重的程度。

刺绣成为一种女子职业,一方面彰显了刺绣在女性解放寻求自立中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也隐含着刺绣与传统性别意识的关联。总而言之,刺绣能给女性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提升了女性的家庭和社会地位,这也是刺绣教育在当时产生的社会意义。

(二) 贤妻良母的形象建构

近代女性教育的发展还是建立在男权社会所主导的、意在唤起女性承担相应社会义务的基础之上,是为了唤醒中国一半人口的女性“开启民智,抵御外辱”。所以,以贤妻良母为目标的教育规训也是近代女子工艺教育的重要教育理念。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一种观点就是,兴办女学的目的是为了让女性更好地操持家务,做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这也是为社会、为国家做贡献。周干庭当时发表演讲曾说:“女子实用之结果,见之于家庭,而培植此实用的基础,则在学校。”^[17]飘萍女史认为,女校应“以贤妻良母为规定女子教育之方针”^[18]。梁启超也强调贤妻良母教育的重要性,他讲到:“女子教育好了,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19]可见,近代女子进校前,她们已经被设定作为“贤妻良母”而加以培养,在这样的教育目标下,早期的女学生无论从行动还是思想都受制于学校的教育安排,刺绣教育也不例外。

从教育内容的设置来看,刺绣教育并不是单纯的技能培养,更重要的是“以彝伦为本,所以启其智慧,养其德性,健其身体,以造就将来为贤母、为贤妇之始基”。另外,《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的规定也明显倾向于培养“贤妻良母”的居家女性,强调女工科“其要旨在使习熟通常衣类之缝法裁法,并学习凡女子所能为之各种手艺,以期俾补家计,兼养成其节约利用好勤勉之常度”^[20]。可见,刺绣教育所传授的知识技能,多半还是养成女性操持家政的综合能力。所以,女子家政能力、文化修养、建强体格的培养也是近代刺绣教育的主要内容,像刺绣、缝纫、编织等传统女红工艺是刺绣传习所的主要手工艺课程,也是女子学堂及女子师范学堂的必修科目,意在培养兼具传统美德与经济独立能力的女子。

“贤妻良母”的教育目标顺应了中国千百年来的女教传统,虽然带有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子,但也包含了男女平等、经济自立、婚姻自由等新思想,有利于在中国新旧生产关系转变的特殊阶段推进女性教育。刺绣作为女性的家庭事业,是广大普通民众思想认识上达成的共识。近代刺绣教育在“贤妻良母”教育观的指导下,将女性的职业能力和家政能力并重,突出女性在家庭中的重要作用。女子通过习绣,不仅获得了一种自立于社会的职业技能,开阔了视野,使其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活动空间,而且提高了女性的整体素质,进而也促进了女性平等权力和自由的实现,为近代女性解放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 工艺发展助力实业救国

近代以来,在“实业救国”政策的号召下,清政府鼓励传统手工艺从业者参加国际赛会,希望通过手工业的发展换取更多资本,以促进实业发展。刺绣教育也很自然地顺应了这一时期的思想。在众多刺绣艺术家的探索变革下,近代刺绣的表现题材和工艺针法等不断学习借鉴西方,具有创新性的“仿真绣”“乱针绣”等新技法迎合了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也得到了众多实业家的积极推广和宣传,带动了国内绣品行业的发展。上海开埠后,随着中国刺绣艺术品在国际博览会上的频繁亮相,并获得全世界的广泛认可和追求,大量海外订单接踵而来,中国刺绣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并在近代社会经济发展中贡献了重要力量。中国近代刺绣市场的短暂繁荣离不开爱国实业家的大力推广。如张謇与沈寿创办的南通女工传习所,其目标不仅是为当地女性提供一技之长,而且还要通过刺绣这一传统的手工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他通过筹建南通绣织局,在上海、美国

纽约等地通过开设分局和办事处等销售模式,将中国刺绣艺术带进广阔的世界市场,对中国刺绣艺术的海外传播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近代刺绣教育培育了大量刺绣从业者,促进了近代刺绣产业的发展。据《中国实业志·江苏省》中记载:“苏州顾绣庄之全盛时期,为民国十年至十五年间,当时每年营业额达四五十万银元。……惟以前出品,多系整幅,刺绣花式甚少变动,近来重视零剪,且花式变动甚速。”^[21]在国际市场的需求带动下,刺绣从传统女红小技化身为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商品,并且以极高的商品价值和海外市场影响力被国内各界关注,成为一时为国争权争利的重要产业。如杨夏在报告书《刺绣论》中指出:“吾国刺绣为世界所崇拜,恒以代表东方美术,销售外洋者,其数颇巨,仅‘广东一省每年以数百万计’。”^[22]仅1900年经广州出关运往海外的粤绣制品价值达白银50万两^[23]。另外,刺绣家林逸娟也强调刺绣是当时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优势产业,并提到“吾国今日除天然物产外,惟有绣工一艺,可以争胜外人,年得外款输入可达百余万元”^[24]。

由此可见,近代刺绣教育在帮助女性个体实现经济自立目标的同时,也通过刺绣产业的发展,为当时的中国社会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的贫弱困局,发挥了传统工艺的社会性价值。

三、近代刺绣教育的特征

从各个刺绣传习所的招生政策来看,近代刺绣教育以社会中下层的女性群体为教育对象,对生源年龄、地域没有太多限制,只要品行端正,有无刺绣基础者都可入校学习。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注重绘画原理传授及刺绣技法的创新,将西方绘画原理与中国传统针法相结合,不断推陈出新;而且注重学生在文化、艺术等方面综合素质的培养;还通过学、产、销三位一体的培养模式将学生的刺绣作品带入市场销售,为广大学生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回报,引导女性走上了独立自主的解放之路。

(一) 融汇中西的创新教学内容

传统的刺绣工艺传承往往“重技轻艺”,刺绣者对画理、物理知之甚少,所用绣线色彩不够丰富,出产的作品往往也略显呆板,不得自然生动之趣。面对这种情况,近代刺绣教育除了传授普通刺绣针法外,更加强调刺绣理论的教学,通过开设相关的绘画课程,加强学生对绘画理论、颜色搭配的分析,并结合相应的针法运用,使丝理、画理、针法得到很好的

融合。其中最突出的创新发展就是引入了西方的绘画理论及教学内容,如上海速成女工师范传习所的教学宗旨就是“采东西各国工艺成法传授,……以期吾国女子人人能精工艺,俾得自立于文明世界”^[25]。除教学内容外,像吕凤子、刘海粟等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画家也积极投入到刺绣的教学及创新中,从素描课程教学开始,研究光影与物体、色彩的关系,进而转换成刺绣针法的表现,为传统的刺绣工艺注入了新的养分,使中国传统刺绣艺术提升到新的高度。像“仿真绣”“乱针绣”等名噪一时,沈寿、华璠、凌杼、杨守玉等刺绣名家辈出。

刺绣针法的创新是近代刺绣教育的突出贡献。其中,沈寿及其首创的“仿真绣”最具有代表性。沈寿本身就有很好的传统刺绣手艺,她因在慈禧寿诞期间进献绣品而得到政府的重用。1905年,在受政府派遣去日本考察期间,西方的绘画、摄影以及日本的“美术绣”对沈寿造成直观冲击,使其对西洋绘画方法和“美术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回国后她在借鉴西方绘画的基础上,把光影融入刺绣当中,创立“仿真绣”,开创了我国刺绣艺术发展的新里程。其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各种博览会,并获得了众多最高荣誉,如《耶稣像》获得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一等奖等。杨守玉始创的“乱针绣”也是吸收了西方绘画的技法与色彩特点,她用类似素描线条的长短不一的交叉针法,再加上分层换色技法,可以绣出西方的油画效果。她认为自然中“虽一草、一细石,无物不有光”,“影因光异,光因色异”,经过“潜心默会”,不断钻研,终于别出新意发明了“乱针绣”。在华璠、许频韵出版的面向刺绣职业教育的教材《刺绣术》中,也重点讲述了基于西画原理创新的新绣法,“新绣法通於画理,注重象真,其要在合光线,配虚实,惟理法较繁”^[26]。可见,融汇中西的刺绣技法创新是近代刺绣教育的重要内容,不仅提高了绣者对刺绣艺术的深入理解,而且促进了刺绣工艺的创新发展。除本土刺绣者在针法上的创新外,西方外来的刺绣针法也为传统刺绣注入了新鲜血液,丰富了刺绣工艺的品种特色。如宁波地区的金银彩绣就是在吸收“外国绷”绣法的基础上开创的。

融汇中西的刺绣教育方式秉持“古今中外,皆为我用”的思想,使习绣者在继承传统刺绣针法工艺的基础上,又娴熟运用西画的笔触、透视、色彩等原理,使画绣相融,展现出刺绣从业者的普适性创新,为中国刺绣的发展增添了色彩与活力。

(二)注重综合素养的课程特色

在“贤妻良母”思想的影响下,刺绣教育在培养学生刺绣技艺及文化知识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女性在职业素养和道德品质方面的综合培养。刺绣技艺的学习强调精益求精的练习和训练,而好的刺绣艺术品一定要有艺术和文化气息,这也要求学生在文化知识、艺术素养方面都要有一定的积淀,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所以,近代刺绣教育在课程设置中加入了有关职业志趣及审美方面的课程,开设了国文、算术、书法、音乐、体育等通识课程,使学生受到全方位的熏陶。因此学生除了提高刺绣技能外,在文化和艺术修养方面也得到了提升,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如吕凤子开办的正则女子学校就非常注重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和训练。正则女子学校校友胡耐秋回忆说:“课外活动分几个组,有昆曲、京剧清唱、丝竹国乐,还有鼓号乐队,课外活动每周两次,每次一小时,每人可以参加两个小组。每到课外活动的时间,丝竹悠扬,歌声嘹亮,使人有一种清新舒适的感觉。”^[27]可见正则校园里课外活动丰富多彩,学生们也可以在多种活泼有趣的活动中得到锻炼。

在众多社会学者及刺绣家的眼中,刺绣本身就具有培养女性品行的重要作用。丁佩认为习绣在家庭生活中最能陶冶性情,她在《绣谱》中讲,习绣能够“使好动者静,好言者默,因之戒慵惰,息纷纭”^[28]。但从技艺的训练来讲,刺绣练习确实是一个枯燥漫长的过程,需要手、心、眼的协调一致,需要安静舒适的环境,所以一针一针的重复性劳作能够使人养成安静平和、静心少言的气质。在审美方面,刺绣所呈现出的各种图案、色彩及情感无不塑造着女性的审美认知。在近代融汇中西的刺绣教学过程中,学生不仅可以学习到中西方绘画中关于美的表达形式和方法,而且她们表现美的能力也得到培养,使脱身于封建社会的女性对中西艺术、社会、经济等有了科学、理性的认识,无形中也塑造着新时代女性的审美观。

对刺绣学生综合素养的培育可谓近代“改造国民性”美育思想的体现,女性通过学习刺绣,不仅提升了自己的审美素养,还可以从仪态、语言、行为、心灵方面得到全方位提升,塑造了新时代知性女性的良好形象,是具有新时代意义的美育。

(三)学、产、销三位一体的培养模式

以女性经济自立为目的的刺绣职业教育在实际教学中注重教育、创作、销售的一体化,学生在学习中制作的实践作品可以通过展览、展销来销售,能够

解决部分学生的生活负担问题。这种在学习创造中创造着一定经济价值的模式,也使女学生看到了学习刺绣的前景,从而更加安心学绣,潜心钻研。

刺绣女工传习所经常通过举办及参与各种展览推销学生的作品,所售之钱可以帮助学生上交学费及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解决了学生的后顾之忧,师生们也可以将所有精力用在刺绣学习上,所出绣品不乏精美绝伦者。如1914年钱伯圭参观美术刺绣传习所后写到:“其所开成绩展览会,海内外人士往观者不下数千人,其绣品之精美非楮墨真之所能罄也。”^[29]南通女工传习所在教育、创作、销售、保护方面形成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一体化职业教育模式,更是近代刺绣教育学、产、销三位一体的培养模式典范。张謇先生筹建的南通纺织局既以销售女工传习所的刺绣工艺品与实用绣品为主,又通过海外办事处远销美国。

学、产、销三位一体的培养模式,实现了刺绣教育、创作、销售、保护一体化,对致力于通过刺绣寻求经济自立的女性来说,有效解决了绣品的营销问题,让广大女性充分认识到通过学习刺绣实现经济自立是可行之路,为近代女性的发展树立了标杆作用。众多女性通过刺绣提高了知名度和社会地位,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四、结 语

刺绣教育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新旧思想激烈碰撞的产物之一,它对近代中国女性教育和艺术设计教育的发展均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在近代“贤妻良母”教育观念的影响下,刺绣教育涵盖在各类女子学校的课程设置中,虽然包含了传统封建女教意识,但在教学内容、教育方式方面都有所创新,其融汇中西的教学内容创新不仅提升了女性的个人整体素质,也促进了传统刺绣的创新与发展;其学、产、销三位一体的培养模式,也将刺绣教育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完美融合,开创了职业教育的新天地。另一方面,它鼓励女性通过刺绣工艺的习得来实现经济自立,进而获得女性应有的社会平等权利和地位。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广大女性不仅通过习绣实现了经济自立和社会价值,更是在“实业救国”的时代浪潮中,以刺绣作为女性救国的利器,通过出口创汇帮助国家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财富,体现出近代新女性的社会担当。这种以促进女性自立为首要目标的普及性工艺教育,是新的社会生产关系重构中刺绣工艺的适应性发展,不仅促进了近代刺绣的创新

和传播,也发挥了传统工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展现了传统工艺的社会价值及意义,为我们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及背景下传承发展传统工艺提供了经验借鉴。

参考文献:

- [1] 于书娟,李燕.清末民初苏南刺绣教育特色及其当代价值[J].教育评论,2017(3):162-165.
- [2] 张蕾.试论女工传习所的职业技术教育范式[J].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9(2):31-33.
- [3] 孙佩兰.张謇与南通女工传习所[J].上海工艺美术,1995(4):38-40.
- [4] 林书羽.沈寿对于中国刺绣教育的贡献[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3:35-40.
- [5] 郭淑敏.从女红到女美术家以南洋劝业会之女性工艺美术展品为中心[J].美术,2017(12):98-100.
- [6] 方秀洁.女性之手:清末民初中国妇女的刺绣学问[J].国际汉学,2015(4):87-108.
- [7] 中华全国妇联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101.
- [8] 沈行恬.张謇教育论文论选注[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17.
- [9] 秋瑾.秋瑾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4.
- [10] 佚名.中华女子美术公司开会记[N].申报,1920-06-15(11).
- [11] 吕去疾.解放后的凤先生[M]//钱凯,吴海祖,吕凤子纪念文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102.
- [12] 李建亮.近代江南民间刺绣图案研究[D].杭州:中国美术学院,2022:47.
- [1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8.
- [14] 陈训正,马瀛.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2071.
- [15] 胡大呆.吾邑女子之自活能力[N].申报,1921-08-05(20).
- [16] 董直.职业为自立之基础常识[N].申报,1925-12-20(11).
- [17] 周干庭,庄维明,吴琬.女学商榷:说女学之改良[J].妇女杂志,1915,1(10):1-3.
- [18] 飘萍女史.论说:理想之女学生[J].妇女杂志,1915,1(3):1-5.
- [19] 梁启超.倡设女学堂启[M]//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789.
- [20] 张援,章咸.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法规汇编:1890-1949[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172.
- [21] 林锡旦.苏州刺绣[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4:85.

- [22] 杨夏. 刺绣论[M]//鲍永安, 苏克勤, 陈泓. 南洋劝业会报告.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0: 181.
- [23] 上海市商业职业技术学校. 中国工艺品知识[M].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95: 134.
- [24] 林逸嫔. 论说: 女子工艺不可废绣论[J]. 妇女杂志, 1915(4): 11-12.
- [25] 朱有璪.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第二辑下册[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639.
- [26] 张华琪, 李许频韵. 刺绣术[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7.
- [27] 胡耐秋. 吕凤子与正则美育[M]//镇江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丹阳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吕凤子纪念文集.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3: 16-19.
- [28] 丁佩著. 绣谱[M]. 姜昶,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3.
- [29] 钱伯圭. 参观美术刺绣传习所记[J]. 香艳杂志, 1914(1): 2.

(责任编辑: 雷彩虹)